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道文化东传问题(上)

蒋立峰

内容提要: 中国道文化东传古代日本, 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 日本学者推出了众多研究成果, 但主流观点是“教团道教未传到日本”, “天皇”“神道”仅限于汉字“借用”而与道教无关, 进而有意无意地否认中国道文化东传日本后对日本古代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中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同样的路数。本文以解读、分析大量可靠的第一手史料为基本方法, 认真分析这些史料所包蕴的古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 总结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道文化经东北亚文化之路东传日本, 不仅对日本民众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日本统治集团的执政理念和方法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道文化和儒文化、释文化共同成为推动古代日本社会发展的三大要素, 对此理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关键词: 中日文化交流 道文化 道教 天皇 神道 四神兽

作者简介: 蒋立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道文化和儒文化两大部分。中国汉唐鼎盛于世, 对外开放, 颇受国际社会尊重, 既与其强大的国力有关, 亦有赖于其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 其中政治文化的贡献更占有突出的地位。中国因而对周边地区政治辐射力和感召力极强, 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政治秩序。日本则是众多学习中国的国家中最努力的实践者, 中日古代政治文化交流因此成为东亚政治文化交流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并且对推动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对以汉唐

时期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中日古代政治文化交流进行深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曾熠熠闪光于东亚尤其日本的历史，对于当代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中日古代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老子道德经》和道家易学等阐述天、地、神、鬼、人关系为主要内容的道文化，和以孔子学说阐述仁、和、礼、义、信为内核的儒文化，以佛学经典教义为内容的释文化东传日本三个部分。对儒文化、释文化东传，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既深且广，亦无大分歧；而对道文化东传，中日学者的研究则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分歧亦明显。本文即从中国典籍传播、日本史籍记录及四神兽壁画墓、日本神道等诸多方面对中日古代道文化东传日本问题披露一二管见，以供学界同人指正。

一 日本的中国道文化东传研究述评

日本学界有关中国道文化东传的研究，首先必须提到日本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年）。津田从其所处时代的需要出发，站在大日本主义的立场上，反复强调日本经历了独自发展的历史过程，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完全相异的两个世界居民，日本文化的发展也与中国文化的影响无关。津田在《支那思想与日本》（1937年）、《日本之神道》（1949年）等著述中指出，虽然过去日本知识界信奉和阅读中国经典，并以此为信条，但是这些来自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源于日本的现实世界却相背离。因此，虽然日本也引入过道教内容，甚至包括“神道”这样的词语，但那不过是单纯的词汇输入，并没能在日本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并成为信仰。换句话说，日本尽管传入了一些道教知识，但并未传入道教这一宗教，所以，日本神道教与中国道教在本质上没有关联。同样，津田在《天皇考》（1920年）中提出，古代日本的“天皇”称号中完全没有中国的意味。至于《日本书纪》中关于宇宙起源的说法，虽然也用了中国式的“天地剖判”这样的表述，也只不过是借用了汉字，字词虽然相同，但是并没有背后的、中国的宗教性意义。津田强调日本文化自身的主体性，认为中国文化包括道教在内，虽然影响到日本，在日本留下很深的痕迹，但那只是一些文字、文献上的“借用”，而不是根本性的影响。津田为与汉学派对抗，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学术文

化,包括中国的民族性宗教道教或道教教理神学抱有偏见,对西方近代科学文明却站在近代文化至上主义立场上崇拜备至。津田的许多观点可谓无视、歪曲甚至抹杀历史事实,在日本学界却博得众多的拥护者,令人遗憾不已。

对此,另一著名学者福永光司(1918~2001年)持有不同的观点。福永认为,津田左右吉作为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东洋学者,由于心中有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自负,又处在日本越来越轻蔑中国的时代环境中,为了强调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优秀性而贬斥中国,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道教的评价很低。津田左右吉的命运说明,学术研究难免为政治“绑架”。黑田俊雄也认为,《日本书纪》确立的“神道”绝不是日本特有的,而是东亚三国共同的习俗性信仰,而作为宗教的神道教最终确立,应当在江户甚至明治时代。甚至有日本学者主张,日本古代的“神道”,本是综合了巫覡方法、记纪神话、祭祀仪式、物忌制度,加上官方制度性的资源,才逐渐成熟起来,至中世末期方形成体系化的神道教。

针对津田主张的“天皇”称号“借用”说,也有很多日本学者从中国和日本文献中找到众多证据,说明中国道教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刻影响,“天皇”称号不只是借用。黑板胜美《我国上代中的道家思想以及道教》利用《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与考古遗迹讨论道教在日本的痕迹;妻木直良《道教思想在日本》讨论了平安时代道教经典传到日本特别是《老子化胡经》传到日本的过程;小柳司气太《道教的本质及其给予本国的影响》更是直接谈论到这一话题。那波利贞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关于道教向日本的流传》指出,道家思想传入日本应当在归化人时期,此后,至少在奈良末期道教传入,并与佛教结合(神佛习合),这时的道教仪式中,如四方拜、祀星、灵符神社、庚申信仰、司禄司命崇拜等,都已进入日本。窪德忠也在《日本的守庚申》中指出,根据奈良县的乡村调查,守庚申传统是由中国道教关于三尸的信仰而来,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在唐代日本与中国的这一风俗就完全相同了。中村璋八认为,“(尽管)带有建立道观与道士布教的教团道教根本没有传到日本来”,但5世纪前后,道教在江南已经合法流传,大量来自朝鲜半岛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归化人,确实会给日本带来道教的各种内容,特别是大和朝的归化人已经在中央与地方占据了重要位置,所以他们虽然并非道士,但是会传播道教信仰知识。

但是，津田的“借用”说也得到众多的支持。中村璋八即认为，“日本使用的‘天皇’这个称呼，在东汉以后已被中国人当作民族宗教的道教所使用，但日本采用的‘天皇’这个称呼，在含义上和内容上，并非作为道教之神的‘天皇’，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五行说和讖纬说中的‘天皇’，仅仅是采用了汉字而已”。另有福井文雅一直站在批判福永光司观点的最前线，故被称为“二福争论”。福井在《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的问题》中，逐条反驳了道教影响说，认为虽然道教知识被日本“借用”，但是道教宗教却不曾“影响”过日本。因为道教和儒、佛不同，“从未有组织性地传来，也没有过祀奉道教神像的教团”，“天皇”之称也不能说是来自中国道教的影响。

日本学界关于中国道教与古代日本的讨论，集中反映在日本道教学会机关刊物《东方宗教》第60号（1982年10月）、第61号（1983年6月）、第62号（1983年10月）上，值得关注。^①日本经济社会学家森岛通夫在1982年出版了英文版《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1984年出了日文版，1986年出了中文版。森岛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十分明确“道教在日本未能确立独立的宗教地位，而由神道替代。实际上，道教（在古代中国时常被称为神道教）在日本是以神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可以认为神道是经过伪装了的道教。”“甚至可以认为神道是道教的日本版，是道教和原始神道的结合；不过，原始神道对这种结合的贡献微不足道。”“实际上，神道即道教，鼓舞了国民精神。”“然而必须强调，中国的道教和日本的神道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后者发挥了把宗教的基本根据应用于日本人的忠诚心和爱国心的作用，而前者在中国则提倡人们应从公务中退休，并隐居起来，宁静而朴素地生活，以便在追求尘世间的幸福之中获得长生不老。”森岛自认为与福永光司的观点“非常接近”。^②

福永光司不为福井文雅等人的批判所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又相继

① 参见葛兆先《国家与历史之间——日本关于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福井文雅《上古日本与道教的关系》，载福井文雅《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徐水生、张谷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7~256页。对津田左右吉的观点及日本学界的相关争论，皆转述于该二文。

② 森嶋通夫『なぜ日本は「成功」したか—先進技術と日本的心情—』、岩波書店、2004年、52-56頁。

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①，不仅详细地介绍了道教在日本的传播、日本各地现存的道教遗迹，对日本神道与中国道教的关系做出明确阐述，指出天皇的名称、神宫（建筑、制度、仪式、服装等）、神道用语等皆来源于道教，而且态度鲜明地批判了平田笃胤，指出“平田笃胤说神道为日本所独有，中国之神道乃我（指日本——笔者注）诸皇神早赴彼处（指中国——笔者注）所授之道。这种说法是违反事实的，中国正是（日本）神道用语及其思想的本家”。^②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福永光司曾来华讲学，对中国学者刚起步的相关研究有很大推动作用。

作为专门性著作，还有下山积与《日本古代之神祇与道教》、松田智弘《古代日本道教受容史研究》等^③。松田智弘在书中对道教如何传入古代日本，尤其如何途经朝鲜半岛传入，“渡来人”在道教传播中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另如对于奈良时代风流（时髦）生活中的道教影响，《记·纪》神仙记述中的道教表现等亦做出了有理有据的陈述，读来颇有启发。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大量经典遗存后，相当部分流入英、法、俄、日等国，其中一部分道文化经典如北周（6世纪）的《抱朴子（敦煌经）》以及唐代的《老子道德经（敦煌经）》、《南华真经（敦煌经）》和《搜神记（敦煌经）》等流入日本。此后，日本学者对包括这些道文化经典在内的各种敦煌经典抄本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出版了许多重要成果。1950年日本道教学会成立，学会会长福井康顺所著的《道教之基础性研究》^④成为当时日本道教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此后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对道教本身的研究，以及道教与佛教、儒教关系的研究，因此各类版本的《老子化胡经》成为日本学者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相比之下，对道教东传

① 参见福永光司·上田正昭·上山春平『道教と古代の天皇制—日本古代史・新考—』、徳間書店、1978年；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文化』、人文書院、1982年；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思想』、徳間書店、1985年；福永光司『道教と古代日本』、人文書院、1987年；福永光司『日本の道教遺跡』、朝日新聞社、1987年。

② 福永光司『日本の道教遺跡』、249頁。

③ 参见下出積與『日本古代の神祇と道教』、吉川弘文館、1972年；中村璋八『日本の道教』、中村璋八『道教3 道教の伝播』、平河出版社、1983年；松田智弘『古代日本道教受容史研究』、人間生態学談話会、1988年（十年后增补为『古代日本道教受容と仙人』、岩田書院、1999年）。

④ 福井康順『道教の基礎的研究』、理想社、1952年。

日本的研究则弱化许多。

1999年，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举办“道教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对道教的内涵有所探讨，但议题较为分散，论文尚欠深度，尤其是对道教在东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道教在日本的传播、道教与神道的关系等论述不多。不过，日本著名文化学者梅原猛（1925～2019年）的观点在研究道文化东传问题时值得注意。“我认为东亚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都是中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日本方面多少有些上升是近一个世纪的事，但在此之前的几十个世纪的中心是中国。古代文明即如此。应在牢牢掌握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思考朝鲜和日本。这绝不是说朝鲜文化、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分店。朝鲜拥有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化进入后朝鲜对之有取有舍，获得了独自发展，日本文化也是如此。中国的文化力与政治力同样强大，尤其文字文化之发达，（朝鲜、日本等）与之有根本性的差距。所以，在不认识中国文化之大的情形下思考日本文化、朝鲜文化是不行的。我赞成从东亚世界看历史，但反对将中国排除在外，或认为日本文化完全是朝鲜文化的分支的看法。”^①梅原猛的观点客观求实，对研究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尤其道文化东传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本文议题限定于中国道文化东传古代日本，时间限定在平安时代末期之前，故日本学者多数与道教相关的研究并不在此范围之内，不再详细叙述之。

二 关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中国学界亦日益重视道文化东传日本的研究，在2006年至2010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中国学者在其中专门的一节论述了道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但对《老子道德经》是否传入日本、何时传入日本这样一个核心问题缺乏明确论述，对于中国道文化东传与日本神道的关系，亦尚无超越前述福永光司论点的更深刻的研究成果。

中国道文化东传日本，似乎是一个显命题。目前留存日本的中国道文化的文物和遗迹并不少见，说明中国道文化东传日本是历史事实。例如，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有中国东汉时代（1世纪）的金铜“羽人”叩拜天神的跪姿

^① 『梅原猛全対話 第二巻 古代日本を考える』、集英社、1984年、228頁。

像、北魏(6世纪)的道教三尊像和道教四面像、南梁(6世纪)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等,这些都是中国道文化东传的有力证据。但本文探究的重点是在日本古代史上中国道文化是否传入日本,如果传入日本,是通过什么路径传入,传入后在古代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占有何等地位,对古代日本的社会发展又产生了何等影响。大量遗存日本的中国道文化文物,虽然辨别其形成时代并不难,但若欲明释这些道文化文物是何时以何种方式流入日本的,则是棘手难解的问题。

为解开此类问题,则不能忽视问世年代明确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能发挥的作用。长期以来,中日学者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进行了很多研究,成果亦多。小长谷惠吉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说稿》、矢岛玄亮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与研究》以及孙猛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①等著作堪称相关研究的代表作。小长谷惠吉之作篇幅不长,确属“解说”性质,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者藤原佐世其人、室生寺本与原本的关系及流传途径,以及所载文献内容等,均有独到的介绍和分析,不失为研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首要参考书。矢岛玄亮之作似为前者的补缺,以大量文献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批列书籍进行了严密的校证,颇有见地,参考有益。而孙猛之作则是在综合前二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几乎解答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对全部批列书籍进行了更深入的校证,如对《老子道德经》^②、《括地志》以及《新修本草》等的解说十分详尽,但对颇受关注的《老子神仙服药经》《老子孔子枕中杂方》《老子教人服药修常住仙经》《老子道精经》等佚亡书籍未能清晰解答,似仍需进一步考证。总之,这部心血之作堪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研究的集大成者,似可视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研究的终结性著作。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久远的敕撰古汉籍目录书,其中近1/3的书目为中国《隋书》《唐书》未记录者,由此可见其珍贵之处。据信《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由位阶正五位下的陆奥守兼大藏少辅藤原佐世

① 参见小长谷惠吉『日本国見在書目録解説稿』、くにたち本の会、1936年、小宮山書店、1956年;矢島玄亮『日本国見在書目録—集証と研究—』、汲古書院、1986年;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② 《老子道德经》版本众多,本文据《老子道德经》,《四部备要》(第5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7页。

(828~898年)于891年前后编撰。编撰该书的原因是日本历代统治者均重视传入日本的中国古籍,以收学习、借鉴之效。9世纪初,嵯峨天皇在皇宫内建冷然院收藏古今汉籍,实为皇家图书馆。但875年冷然院大火,藏书大部毁于一旦,(阳成、光孝、宇多)天皇于是命征集图书、编撰书目以便更好地保存现有图书。949年冷然院再次遭大火,后改名为冷泉院并于960年重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原始本早已无存,但据现存最早本室生寺本^①(对原始本中的杂史家、刑法家、杂传家、杂家、兵家、天文家、五行家和医方家诸门类加以简化,其他门类未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多处记有某某书藏于“冷然院”或“冷泉院”字样。这使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何时成书、是否藤原佐世一人所著成为疑问。

本文不求解答上述问题,而是专注于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内容的分析,视角不同于已有研究。纵览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全书,共40门,史家、刑法家、土地家、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天文家、历数家、五行家、医方家、小说家、楚辞家等,应有尽有,唯独缺少释家(佛家),仅在第20门杂传家中有《高僧传》14卷、《续高僧传》30卷、《西域求法高僧传》1卷、《高僧传要抄》2卷和《名僧传》30卷,这一规模与儒家、道家的书目规模根本无法相比。关于儒家,除第24门儒家含134卷,有晏子、孟子、曾子等人著作外,主要是第8门论语家269卷,有郑玄、陆善经注《论语》10卷、梁武帝撰《孔子正言》20卷、郭璞注《尔雅》3卷,以及《小雅》、《广雅》、五经六艺等书,但这与道家之规模尚无法相比。

该书目第25门道家含458卷,其中各种《老子》计26种;有柱下史李耳(老子)撰、西汉文帝时河上公注本(亦称《河上公章句》),以及曹魏王弼、周文帝、唐玄宗各注本,还有梁武帝、周文帝、王弼各撰《老子义疏》,唐玄宗撰《老子疏》,南朝梁陈周弘正撰《老子赞义》《老子义记》,东汉严遵撰《老子指归》,东晋李轨撰《老子音》等,另有《老子化胡经》《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化(纪)经》。

除《老子》外,道家门还录有《庄子》21种、《列子》3种和《文

^① 以下论述参见藤原佐世『日本国見在書目錄—宮内庁書陵部所蔵室生寺本—』、名著刊行会、1996年。

子》，合称“唐时道家四经典”。不仅如此，还有《鬻子》（鬻子被称为道家“开山之祖”，周文王、周武王之师，主张发令施教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常道乃黄帝之道、五帝之道、《鹖冠子》（战国时楚隐士）、《幽求子》（晋杜夷）等阐述道家思想主张的著作，另外还有葛洪《抱朴子》内篇、冷然院《广成子》、符朗《符子》、张讥《玄书通义》以及《道腴》、《本际经》、《太上灵宝经》、《冲虚真经》、《治魔宝真安志经》。至此可以说，《老子》即《道德经》以及大批重要的道家经典，在古代已传入日本，其数量之多，远在儒家、释家之上，这应是确认无误的历史事实。

不仅如此，该书目开篇第一门为易家 177 卷。首目即晋萨真注《归藏》4 卷，相传为黄帝所著，亦称《商易》，与《连山》《周易》统称为“三易”，入汉后已佚亡。^① 其后《周易》更有 7 种，有东汉郑玄本、汉书经籍志本、西汉京房本、曹魏王弼本、东晋张播本、唐陆善经本和冷泉院本，其他还有《周易讲疏》《周易通义》《周易正义》《周易私记》等。该书目编目效仿中国古典，按经史子集分门别类，常云“易乃五经之首”，故而亦仿隋唐以易家为首门。《易经》虽与儒家不无关系，但从其内容上说，它首先应是道文化范畴内的经典，而且是主要经典之一。这充分显示出道家易学在中国唐代及大约相同时期日本政治思想领域的极重要地位。道家易学是阐释治国理政、追求国运昌隆的学问，因此被统治者分外重视，视为第一学问理所当然。

此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还在多门中录有直接与道家相关的书籍。第 20 门杂传家有葛洪《神仙传》、干宝《搜神记》、刘向《列仙传》；第 21 门土地家有郭璞注《山海经》（另 4 种）；第 30 门杂家有吕不韦《吕氏春秋》、刘安《淮南子》以及魏征《群书治要》（前述《老子》、《庄子》、《列子》、《文子》、《鬻子》和《鹖冠子》等皆被收录其中）；第 35 门有《长历》^②；第 36 门五行家有咒禁、符印、五行、六任、雷公、太一、易、遁甲、式、相、仙术等内容的书籍，据编纂者减略后的记载，有《三甲神符经》、《五行大义》（另 9 种）、《五明论宝剑镜印法》、《大道老君五行秘

① 虽然 1993 年湖北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中出土了秦简《归藏》，但仅有 394 枚 4000 字，仍残缺不全，难以窥该书全貌。

② 此书与记叙盘古开天辟地、已佚亡的《三五历》有无关系待考。

符》、《太一经》（另9种）、《易髓》（另9种）、《遁甲》（另9种）、《式经》（另4种）、《宇宙经》、《新撰阴阳书》（另1种）、《讖书》（他3种）、《天镜经》、《地镜经》、《乾坤镜》、《玄经》、《龙首经》（另1种）、《东方朔书》等。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在第37门医方家中列有的《老子神仙服药经》、《老子孔子枕中杂方》、《老子教人服药修长住仙经》和《老子道精经》4部书，皆《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未见者。此老子非彼老子耶？如果今后深入研究，或能解答老子如何从医就药的疑问。

显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中国唐代宗教存续状况的反映。唐王朝的宗教政策总体上相对灵活，但因统治者视老子为本宗圣祖，故在多数时期崇道抑佛的倾向比较明显。武德八年（625）唐高祖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道大佛小。”^①唐高祖以此为后世定下“先老、次儒、末后释”的基调。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诏曰：“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②武则天当权时，佛教一度恢复发展，但仍无法取代道教的至上地位，及至9世纪中期武宗灭佛，佛教大受打击。在此四五十年后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少有佛家经典，而有大量道家易学经典，且在第21门谱系家有《黄帝大圣李氏谱》《太宗文武圣皇帝行记》《李氏谱》，自然有其历史原因在内。

在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进行如上分析后，还必须指出一点，一般认为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12世纪的日本平安时代末期，该书因系手抄本，错漏字在所难免。例如，在第25门道家，就将“老子音”误抄为“孝子音”，但书中其他应为“老子”之处正确抄书无误。所以，根据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老子道德经》至晚在9世纪末已存在于日本。既然如此，为何现在中国学者甚至部分日本学者在论述道文化东传日本时极少提到这一点？其原因是，在原本佚亡后，室生寺本成唯一存在于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因学术价值颇高，受到世人瞩目，故而陆续出现了众多种类的再传抄本，1851年安井衡校本即为其中影响较大的

① 《续高僧传》卷24《慧乘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40~941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113《道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86页。

版本。室生寺本后被收藏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而安井衡本被收藏入1928年出版的《续群书类从》第三十辑下册“杂部”。这样一来，安井衡本的适众性显然高于室生寺本。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安井衡本电子版很快出现在互联网上，中国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以互联网上能够方便查阅的安井衡本为依据，实乃必然之举。然而，安井衡本却出现了一个重大疏漏，即在抄录第25门道家时，竟然将第一篇《老子》误抄为《孝子》，而第二篇以后的“老子”二字均以同名省略符号“々々”代替，直到第25篇又写成“孝子音”，紧接着第26篇抄为《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化胡经》（此后在第37门医方家还抄有《老子神仙服药经》、《老子孔子枕中杂方》、《老子教人服药修长住仙经》和《老子道精经》），似乎在表明抄本时“老”与“孝”二字是有区别的。中国学者对此有疑惑，第7门专为孝经家，录有郑玄、唐玄宗等注各类孝经及相关图书20种45卷，显然第25门道家内只应有《老子》而不应有《孝子》，而道家第24篇抄为“々々化胡经”，显然只能是《老子化胡经》，第25门道家前24篇的“々々”应为“老子”无疑。不过，只要未看到室生寺本将第25门道家第一篇明确抄录为“老子”，多数中国学者也只能依据安井衡本，指出《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化胡经》东传日本，而避免言及《老子道德经》是否东传古代日本并有何等重大影响这一更重要的问题。^①

而且直至18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和平有序，学术风甚浓，各种书目类书籍多出，如《倭版书籍考》《辨疑书目录》《掌中目录》《掌中书名便览》《正斋书籍考》等，都记有《老子》《周易》《庄子》《抱朴子》等典籍存于日本。此系限外之话，容略免述。

三 关于“日本六国史”

既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有大量中国道文化典籍东传古代日本，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中国道文化东传对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何等作用。

^① 其实，“老”“孝”之误乃古典中常见。中国撰佛经《清净法行经》中有“摩诃迦叶，彼称孝子”句，其中的“孝子”亦为“老子”之误笔。参见河野训『中国の仏教受容とその展開』、皇学館大学出版部、2013年、54頁。

这首先需从日本正史即“日本六国史”中寻找答案。

所谓“日本六国史”，即六部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和《日本三代实录》。此六部日本史书记录年限为神代时代至仁和三年（887）八月二十六日^①光孝天皇去世、宇多天皇继位，恰为日本古代史之重点时间段，亦与本文考查论述的时间段相吻合。故在日本正史即六国史中对中国道文化东传古代日本发挥何等作用有何记录，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此六部书为天皇朝廷敕命重臣编撰、成书后又上报朝廷得其认可的“敕撰”国史书，即为正史。除此之外，影响较大的《古事记》是“敕撰”还是“私撰”说法不一。太安万侣乃奉敕编写此书，712年成书后又上报朝廷，似应为“敕撰”，但其内容是奉敕记录舍人稗田阿礼之叙史，因此从内容看此书又类似于“私撰”，故而未进入“敕撰”国史之列。

“日本六国史”的记史方式大致相同，主要记述天皇及朝廷的活动，以及社会状况、对外关系等。以下依次叙述各史中关于道文化东传日本的部分记录，并从中得出合理的结论。

（一）《日本书纪》

《日本书纪》由舍人亲王主持编撰。该书关于“神代”的记述，毫无疑问显露出中国道文化的影响。尤其开篇部分，“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浑沌如鸡子……”以及“乾道独化”、“乾坤之道相参而化”等描述^②，均大致源于被《释日本纪》《日本书纪纂疏》等引用的中国古典《三五历记》。如《先代旧事本纪》《神皇系图》等日本更早的历史书也都是基于《三五历记》的阴阳思想（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写成的。^③按照易学阴阳论，日神、月神应分别是男神和女神，14世纪的抄本

① 本文所记月日为阴历。

②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前篇』、吉川弘文館、1983年、1頁、4頁。

③ 参见『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8卷） 日本書紀私記・釋日本紀・日本逸史』、吉川弘文館、1965年、71頁；図書刊行会『続々群書類従 第一』、平凡社、1970年、5頁、8頁、9頁；天理図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編集委員会『天理図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第二十七卷 日本書紀纂疏・日本書紀抄』、天理大学出版部、1977年、22頁、31頁。

《神道集》(编者不明)也称二神“产一女三男,其三男者,是日神月神素盞鸣尊,一女者,蛭儿尊是也”。^①《日本书纪》与《古事记》一样,将日神定格为女神,可能是为讨成书时代女帝的欢心。

据《日本书纪》记载,天皇谱系中第11代垂仁天皇,垂仁九十年(61)二月一日条记曰“天皇命田道间守遣常世国,令求非时香菓。今谓橘是也。”^②此所谓“常世国”,即神仙所居之处,俗人难至也。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此条记录尚属神话传说中的内容,一般认为至270年第15代应神天皇即位,其记录方有较大的真实性,大陆人移居日本的第一个浪潮就发生在应神天皇时期。应神十四年(283)据说是秦始皇时代汉人子孙的弓月君“领己国之人夫百二十县而归化”;应神二十年(289)九月,东汉灵帝时代汉人子孙“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③不可否认,这成为中国道文化东传的重要历史背景。

第21代雄略天皇在位时,雄略二十二年(478)七月条记曰“丹波国余社郡管川人水江浦岛子乘舟而钓,遂得大龟,便化为女。于是浦岛子惑以为妇,相逐入海,到蓬莱山,历睹仙众,语在别卷。”^④这显然是附会道教蓬莱仙境、神仙思想而杜撰出的记录,事虽非真,但此记录反映出5世纪后期中国道文化已在日本社会流行起来却是真。如果能查到“别卷”细听众仙之语,则更有趣。雄略在位时期与大陆交往甚密,史记中“吴人”“汉客”“秦民”以及由中国移民(“归化人”)发展成的“陶部”“鞍部”“画部”“锦部”“译部”等语频出,不难想象当时中国移民众多之程度。有此强大载体,道家神仙思想随之东传至日,应是无可置疑之事。

第26代继体天皇在位时,继体七年(513)六月,百济“贡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段杨尔”;继体十年(516)九月,百济“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依请代之”。^⑤第29代钦明天皇,钦明十四年(553)日本朝廷遣使至百济,应允向百济派遣援兵,并提出“医博

① 近藤喜博编《神道集》、角川书店、1978年、6页、236页。

②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前篇』、192页。

③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前篇』、276页、278页。

④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前篇』、388页。

⑤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吉川弘文馆、1982年、23页。

士、易博士、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① 翌年百济如日所请新派出五经博士和僧人，以及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及采药师、乐人等至日工作。

第30代敏达天皇，“不信佛法，而爱文史”。^② 第31代用明天皇，“信佛法，尊神道”，于磐余筑宫，曰池边双槻宫，并遣皇女“拜伊势神宫，奉祀日神”。^③ 第33代推古天皇，推古十年（602）“冬十月，百济僧观勒来之，仍贡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也。是时选书生三四人以俾学习于观勒矣。阳胡史祖玉陈习历法，大友村主高聪学天文遁甲，山背臣日并立学方术，皆学以成业”。^④

第35代皇极天皇在位时，皇极三年（644）七月条记曰“东国不尽河（富士川）边人大生部多，劝祭虫于村里之人曰，此者常世神也。祭此神者，致富与寿。巫婆等遂诈托于神语曰，祭常世神者，贫人致富，老人还少。由是加劝舍民家财宝、陈酒陈菜、六畜于路侧，而使呼曰，新富入来。都鄙之人取常世虫置于清座，歌舞求福，弃舍珍财。都无所益，损费极甚。于是，葛野秦造河胜，恶民所惑，打大生部多，其巫婆等恐，休其劝祭。”^⑤ 此段记叙生动地描绘出道家“长生不老观”传入日本后所产生的广泛社会效应。所以，梅原猛认为，弥生时代不仅传来稻作农业，还有与此前完全不同、以道教为背景的个人不死思想。这种思想从弥生时代经过古坟时代一直流传于后来的日本。^⑥

第36代孝德天皇，“尊佛法，轻神道（砍生国魂社树之类是也）”。^⑦ 皇极四年、大化元年（645）六月十二日发生宫廷政变，苏我氏势力被铲除。十四日，孝德即天皇位。十九日，改元，并召集群臣盟誓。九月初又发生古人大兄皇子等“谋反”事件。九月十九日，孝德天皇诏曰“易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害民。方今百姓犹乏，而有势者分割水陆以为私地，卖与百姓，年索其价。从今以后，不得卖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百

-
- ① 派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来日替换原有人员工作之意。参见『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79頁。
- ②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101頁。
- ③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119頁、120頁。
- ④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140頁。
- ⑤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205頁、206頁。
- ⑥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梅原猛著作集5 古代幻視』、小学館、2001年、542頁。
- ⑦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215頁。

姓大悦”。^①大化五年(649)“置八省百官”^②,在中务省下设阴阳寮,内设阴阳博士、阴阳师等职,阴阳寮以编造历法时刻、占卜吉凶祸福、探究祥瑞灾异辅弼天皇统治。显然,阴阳寮的工作离不开道文化的基础性支持。

至第37代齐明天皇在位时,齐明元年(655)五月庚午,“空中有乘龙者,貌似唐人,着青油笠,而自葛城岭驰隐胆驹山。及至午时,从于住吉松岭之上,西向驰去”。翌年,“于田身岭冠以周垣,复于岭上两槻树边起观,号为两槻宫,亦曰天宫”。^③

第40代天武天皇,“生而有岐嶷之姿,及壮雄拔神武,能天文遁甲”。^④《日本书纪》关于天武天皇的许多记录也表达出这一点。天武四年(675)元旦,“大学寮诸学生、阴阳寮……等捧药及珍异等物进”,天武朱鸟元年(686)正月十三日,“召诸才人、博士、阴阳师、医师者并廿余人,赐食及禄”,^⑤由此可见天武天皇对阴阳学是何等重视。也正因如此,天武十三年(684)十月一日,天武天皇下诏曰“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一曰真人……五曰道师……是日,守山公……十三氏赐姓曰真人。”^⑥道教名称“真人”“道师”皆列入姓,显示道文化在日本政治文化中的影响已大大增强。

这些记录表明,在天皇制形成初期,信佛法抑或尊神道,二者之间的斗争颇为激烈。当然,此中的神道应视为在中国道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以皇室传承为中心的日本宗教。而关于“乘龙者”和“两槻宫”的记叙及前述拜常世神之众举,则为论述中国道文化在古代日本的早期影响的众所熟知的例证。

最后,第41代持统天皇,于持统八年(694)十二月六日,“迁居藤原宫”^⑦。1981年5月,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发表《飞鸟藤原宫发掘调查出

①『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223頁 《周易》第42卦曰“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参见《周易注》,〔魏〕王弼注,《景印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第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6页。

②『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224頁。

③『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261頁、262頁、263頁。

④『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307頁 “岐嶷”,伟硕超群之意。

⑤『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335頁、336頁、382頁。

⑥『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372頁、373頁。

⑦『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書紀 後篇』、423頁。

土木简概报（六）·藤原宫出土木简（五）》，概述了1980年4月至1981年3月第29次调查出土的第5批藤原宫出土木简的状况及内容。该批次木简为大宝年代（701~704年）遗存，从木简所记文字内容看，绝大多数为宫内各项物品的交付记录，还有少量宫内活动和官员任免的记录。其中有一条木简记录值得注意，即在宫南面外濠出土的QP29~081号木简，其内容为“道可非常道□”。这一记录理应是中国的《老子道德经》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因记录者对《老子》不熟悉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误记，记录时漏掉了“道可道”的第二个“道”字，而误将此“道”字放在了“非常道”（已看不清，故以□代替，由于网上未公布此木简照片，只能推测。中国学者多写为“道可道非常道”，实为讹传。另有一同类编号木简记录为“道道道道□□□□”，难解其意，或亦与道学有关）之后。但据此至少可推定，中国道文化在大宝年代不仅已传入日本，而且在皇室具有影响，这与前文所叙日本史籍记录具有互为印证的一致性。^①

（二）《续日本纪》

该书于797年成书，由藤原继绳、菅野真道等编撰，记录697年至791年的日本史。大宝元年（701）正月朔日条记载了文武天皇的元旦朝贺（贺正）仪式“天皇御太极殿受朝，其仪，于正门树乌形幢，左日像、青龙、朱雀幡，右月像、玄武、白虎幡。蕃夷使者，陈列左右。文物之仪，于是备矣。”^②天皇面南，故左为东，右为西。文武天皇欲以此种代表当代先进文化、规模盛大的外交仪式来彰显日本与唐朝的对等地位，而青龙、朱雀、玄武、白虎幡被称为“四神旗”，是道文化东传古代日本的生动说明（关于“四神旗”后文详述）。

同年2月14日条记曰“释奠。（注：释奠之礼，于是始见矣）”^③所谓“释奠”，即孔子祭，每年二月、八月在大学寮祭孔子及十哲，是日本朝廷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天皇重视，朝廷大臣亦需参加。由文章博士出题，轮流

① 『飛鳥藤原宮発掘調査出土木簡概報（六） 藤原宮出土木簡（五）』、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昭和五十六年五月、https://repository.nabunken.go.jp/dspace/bitstream/11177/1007/1/BN04187634_06.pdf [2019-01-02]。

②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続日本紀 前篇』、9頁。

③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続日本紀 前篇』、9頁。

讲解,亦可辩论,学术气氛浓厚。传自中国,在日本亦延续多年。此学术讨论的内容自然包括儒、道在内,此待后叙。

天平八年(736)八月二十三日条记曰:“入唐副使从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等,率唐人三人、波斯人一人拜朝。”十一月三日条记曰,圣武天皇“诏:授入唐副使从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从四位下……唐人皇甫东朝、波斯人李密翳等,授位有差”^①。这表明当时的天皇朝廷对派遣遣唐使一事的重视,但未记录遣唐使中臣名代在唐朝的活动。对此,恰有中国史籍可查。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所记,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闰十一月,“日本国遣其臣名代来朝,献表恳求《老子》经本及天尊像以归,于国发扬圣教。许之。”^②此条记录显示出日本使臣引进中国道文化的真切意愿,可以认为作为中国先进文化核心内容之一、唐时盛行的道文化东传日本乃必然趋势。

天平宝字元年(757)十一月九日条记曰:“(孝谦天皇)敕曰:如闻,顷年,诸国博士、医师,多非其才,托请得选。非唯损政,亦无益民。自今以后,不得更然。其须讲,经生者,三经……阴阳生者,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匱,五行大义”^③。这段记述表明当时的天皇朝廷对各地无真才实学者靠走后门谋学位的现象非常不满而欲加限制,要求今后的博士生必须会讲解相关的学问,其中阴阳生必须会讲解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匱及五行大义。

天平宝字三年(759)六月十六日条记曰:“(淳仁天皇)诏曰:……自今以后,追皇舍人亲王,宜称崇道尽敬皇帝,当麻夫人称大夫人,兄弟姐妹悉称亲王。”^④这是《日本书纪》的主编舍人亲王之子即位天后对其父的最高褒奖,其中“崇道”之“道”应为天皇治世之道,当然包括道家易学的内容在内;称“皇帝”而不称“天皇”,似为表明舍人亲王生前重视吸纳中国先进文化的性格。《日本书纪》的编纂和记叙充分反映出这一点。

天应元年(781)六月二十五日条记曰:“远江介从五位下土师宿祢古人、散位外从五位下土师宿祢道长等一十五人言……望请因居地名,改土师

①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続日本紀 前篇』、141頁。

② 《册府元龟》(第1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559页。

③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続日本紀 前篇』、243頁。

④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続日本紀 前篇』、262頁。

以为菅原姓。敕依请许之。”^①此土师（菅原）道长之名“道长”，显然取自《周易》第八卦“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句^②，乃以名显志也。

（三）《日本后纪》

该书于840年成书，记录了792年至833年的日本史。主编者为左大臣藤原绪嗣。藤原在奉呈《日本后纪》的奏章（代序）中称：

臣绪嗣等，讨论绵书，披阅昔策，文史之兴，其来尚矣。无隐毫厘之疵，咸载锱铢之善。炳戒于是森罗，徽酋所以昭晰。史之为用，盖如斯欤。伏惟前后太上天皇，一天两日，异体同光，并钦明文思，济世利物，问养马于牧童，得烹鲜于李老。民俗未饱昭华，薜萝早收浼汗……（臣等）错综群书，撮其机要，琐词细语，不入此录。接先史后，缀叙已毕。但事缘例行，具载曹案，今之所撰，弃而不取。自延历十一年正月丙辰，迄于天长十年二月乙酉，上下四十二年，勒以成四十卷，名曰日本后纪，其次第列之如左。庶令后世视今，犹今之视古。臣等才非司马，识异董狐，代匠伤手，流汗如浆。谨诣朝堂，奉进以闻。谨序。^③

不言而喻，此奏章充分显示出八九世纪日本官僚及知识界的汉语水平甚高，关于中国史的知识颇为丰富，对中国百家学术思想的理解甚为深刻。仅以其中赞美前后两位太上天皇（嵯峨、淳和）之句为例（此句与其他后世传抄本无区别），即“钦明文思，济世利物，问养马于牧童，得烹鲜于李老。民俗未饱昭华，薜萝早收浼汗”句。其中，“钦明文思”为《尚书·虞书·尧典》中赞美尧帝之名句^④，“济世利物”应是意出《庄子》，庄子曰“利泽施于万世”（《庄子·外篇·天运》），“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外篇·天地》）^⑤。再有“问养马于牧童”，取之于《庄子·杂篇·徐无鬼》中

- ①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続日本紀 後篇』、吉川弘文館、1983年、474頁、475頁。
- ② 《周易注》，〔魏〕王弼注，《景印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第7册），第214页。10世纪末权倾朝野的藤原道长之名亦如此。
- ③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後紀』、吉川弘文館、1982年、1頁、2頁。
- ④ 《尚书》，《四部备要》（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3页。
- ⑤ 《庄子》，《四部备要》（第53册），第51、60页。

黄帝求治国之道于乡野牧童的故事。黄帝问如何“为天下”，牧童答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①。“得烹鲜于李老”，显然源自《老子道德经》中之名句“治大国若烹小鲜”^②。“民俗未饱昭华，薜萝早收涣汗”中“昭华”，为汉《尚书大传》用语，美玉之称^③；“涣汗”，《易经》用语，大水之意，亦引申为王命^④，从上下文关系看，此句似可理解为“民意未达最佳，吾等（以隐士自谦）早受王命（续修国史）”。由此不长之奏章即可看出，《庄子》《老子》《易经》等中国道文化经典对日本当权者的影响何等深刻。

《日本后纪》共40卷，现存仅10卷，其他已佚失。朝日新闻社电子版《日本后纪》对佚失部分，采用《类聚国史》《日本纪略》的相关记叙予以补缺。其中的延历十九年（800）七月二十三日条记曰：“（桓武天皇）诏曰：朕有所思，宜故皇太子早良亲王追称崇道天皇，故废皇后井上内亲王，追复称皇后，其墓并称山陵。”此条即依据《类聚国史》《日本纪略》相关记叙补缺而成。^⑤结合早良亲王之生平，细体其“崇道”之“道”，同前述天平宝字三年条，应为包括道家易学内容在内的天皇治世之道。弘仁三年（812）九月十日条记载，某某大臣向天皇上表曰“伏惟皇帝陛下，道高万古，功迈百王”。^⑥此处之“道”则指统治国家的能力与方法，与前述之“道”有意义相通之处。

以下为《类聚国史》补充之史料。弘仁十四年（823）四月二十五日条记载，淳和天皇（对太上天皇）言：“……然则世有淳醜，时有今古。若推鸿荒之风于名教之代，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世也。”^⑦这是淳和劝说嵯峨接受太上天皇名号时说的话，此前一日嵯峨表示“欲从古朴”无须尊号，淳和天皇才说要将远古荒蛮混沌之风推至礼教名分严明的当代，这是老庄的主张，因不合时宜应被抛弃。淳和如是说，似仅为劝说嵯峨而已，并非想抛

① 《庄子》，《四部备要》（第53册），第97页。

② 《老子道德经》，《四部备要》（第53册），第21页。

③ 《尚书大传》，《景印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第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9页。

④ 《周易》，《四部备要》（第1册），第43页。

⑤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類聚国史 第一』、吉川弘文館、1981年、155頁。

⑥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後紀』、118頁。

⑦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類聚国史 第一』、143頁。

弃老庄之学。所以，淳和天皇自己在天长十年（833）让位后，在辞受太上天皇尊号时即称“老聃杜企跨之涂，量不可强；庄叟开性分之处，谬以太上天皇之授也”^①，仍以老庄之学为拒受太上天皇尊号作托词。

天长三年（826）九月六日条记曰：“伊豫守从四位上安倍朝臣真胜卒……任阴阳头、……神祇伯……天资质朴，不好祇媚。学老庄，能口自读如流。”^②当时，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去世，史家往往给予总结性评价，似盖棺定论。从对安倍真胜的评价可以看出，当时老庄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较为深奥的学问，在学术层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学老庄”与最后任神祇伯应有内在联系。

（四）《续日本后纪》

该书于869年成书，藤原良房等编撰，记录了833年至850年仁明天皇一代的日本史。天长十年（833）二月二十九日条记载，仁明天皇上表太上天皇请莫让位，“……人之所愿，天必随。道之所通，物不拥……天道无私，冀垂鉴许。”^③此所谓“天道”应与老子之道有相通之处。

承和七年（840）三月二十六日条记曰：“（仁明天皇）敕符陆奥守正五位下良峰朝臣木连、前镇守将军外从五位下匝瑳宿弥末守等，省今月十八日奏，知发援兵二千人。案奏状云，奥邑之民，共称庚申，溃出之徒不能抑制。是则惩又往事之所为也。自非国威，何静骚民。事须调发援兵，将侯物情。其粮料者，用当处谷。但上奏待报，恐失机事，仍且发且奏者。夫预备不虞，古今不易之道也。是以依请许之。宜能制民夷，兼施威德。”^④此段记录表明，840年春季，陆奥地区（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庚申之乱”，大批民众涌出街市以“守庚申”，中央政府不得不派出二千援兵前往镇抚。而且此类事件以前亦有发生。朝廷希望威德并施，以静骚乱之民。所谓“庚申”，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微旨》中云“按《易内戒》及《赤松子经》及《河图记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

①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類聚国史 第一』、146頁。

②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類聚国史 第二』、吉川弘文館、1981年、281頁。

③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続日本後紀』、吉川弘文館、1983年、4頁。

④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続日本後紀』、100頁。

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① 总之是劝人乐善勿恶，并在庚申日不能睡眠，否则人身上的三尸（虫）会乘人睡眠之机，上天向主管人寿的司命汇报该人的恶行罪过，从而被司命减寿甚至夺命。大批陆奥民众走上街市以“守庚申”，以致官方不得不出兵镇抚，这说明葛洪的《抱朴子》在当时日本的边远地区的影响已如此之大，更何况在京都、奈良这些中心地区了。古代科学不甚发达，凡人无不欲求长生不老，而道文化则包含助人实现此种欲望的“工具”或“途径”，这或是道文化能够在日本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然不知何故，当代日本的史学者对此事件极少言之，颇逸常理。

承和十四年（847）五月十一日条记曰：“于清凉殿，行庄子竞宴。先是，帝（仁明天皇）受庄子于文章博士从五位上兼备中守春澄宿祢善绳。是日，引善绳宿祢殿上，殊酌恩杯，行束脩之礼。令左右近习臣，各赋庄子一篇。管弦更奏，酣畅为乐，庭燎皙皙。赐善绳宿祢御衣二袭。自外之物，亦称是也。赐近臣禄各有差。当代儒者共以为荣。”^② 这是一幅多么谐美祥和的君臣庄子竞宴图。还需注意最后一句“当代儒者共以为荣”，即当代知识分子皆以此为荣，并无门派之见，这也说明了老庄之学对当时朝廷内外之影响何其巨大。

承和十五年（848）六月五日条记曰：“（仁明天皇）敕曰，灵心演祝，佇休历而必臻；神道效祲，在至仁而斯感……况复神无常祐，惟德是依。瑞无常臻，因化呈象。故宝祚之庆，在道不在神。天下之平，惟人在惟瑞。”^③ 显然，此“宝祚之庆，在道不在神”之道，亦应包含老子之道的内容。

嘉祥二年（849）十一月二十二日条记曰：“皇太子上表……伏愿，中和所乐，德广弥彰。保万寿之无疆，怀百神之多福。人称有道，我乃无为。使群臣成鹿苹之欢，六方致鳧藻之感。”^④ 显然这是关于老子主张的无为之道的直白表述，而“鹿苹之欢”乃取自《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

① 《抱朴子》，《四部备要》（第55册），第24页。

②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続日本後紀』、199頁。

③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続日本後紀』、212頁。

④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続日本後紀』、229頁。

有嘉宾，鼓瑟吹笙”句^①，“鳧藻之感”乃取自东汉杜诗语“将帅和睦，士卒鳧藻”^②，均取悠闲、欢悦、和睦之意。

（五）《日本文德天皇实录》

该书于 879 年成书，藤原基经等编撰，记录了 850 年至 858 年的文德天皇在位的日本史。仁寿三年（853）四月十四日条记曰“大内记从五位下和气朝臣贞臣卒。贞臣字和仁……弱冠从治部卿安倍朝臣吉人受老庄，吉人奇之。后入大学。研精不息。”^③

齐衡元年（854）八月二十五日条记曰“散位外从五位下名草宿祢丰成卒。丰成，少学老庄，长读五经，义理颇通。学徒多属。天长七年为大学博士，承和四年为直讲。八年转为助教。十一月叙外从五位下。十一年正月以其老耆，遥授骏河介，以充教授之资。卒时年八十三。”^④此条记录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从学童至教授的成长发展经历。“少学老庄”，似乎表明老庄之学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成长的必修课、基础课。“学徒多属”，表示此师学生众多，颇受欢迎。最后朝廷给予教授资格，是对其一生做学问的肯定与褒奖。其中，老庄的作用不可或缺。

天安二年（858）三月十五日条记曰：“（文德天皇）有敕，令相摸介从五位下滋野朝臣安成，讲老庄于侍从所，令文章生、学生等五人预听之。”^⑤天皇亲自下令，命滋野安成在侍从所讲老庄，而且为保证效果还要预讲，其目的是向天皇周边人等推普老庄学问，以懂得无为之治与社会大治之关系。由此可见，文德天皇对老庄学问是何等重视。

（六）《日本三代实录》

该书于 901 年成书，记录了 858 年至 887 年清和、阳成、光孝三代天皇在位时的日本史。编撰者为左大臣藤原时平、右大臣菅原道真（后被贬谪）等。该书序中有言“今上陛下（醍醐天皇），承累圣之宝称，顺兆民之乐

① 《毛诗注疏》，《景印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第 63 册），第 438 页。

② 《后汉书》，《二十五史》（第 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900 页。

③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文德天皇実録』、吉川弘文館、1981 年、50 頁。

④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文德天皇実録』、64 頁。

⑤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文德天皇実録』、113 頁。

推。天纵雄才，嗤汉武于大略；德尚恭己，法虞舜之无为。”^①《老子道德经》曰“为无为，则无不治。”^②显然，老子无为政治成为编撰该书的指导思想。菅原道真其实就是一位多学才子，除《汉书》《史记》《文选》《春秋》《白氏文集》及各类医书外，《老子》《庄子》也是其伴身随行之宝典。其名“道真”，源自东汉司马彪注《庄子》。该书在中国早已佚失，但列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说明平安时代日本仍存有此书，菅原道真必稔读此书。唐初训诂学家陆德明释《庄子》，在《庄子·外篇·天地》中“黄帝……遗其玄珠”句后注曰“玄珠，司马云道真也。”另在《庄子·外篇·天道》中也有“夫道……极物之真”句。“极物之真”即探求事物本质、本源之意。总之，“道真”即道学之本质、精华之意，亦表示菅原道真对道学的追求是何等热情。有此缘故，《日本三代实录》中有更多事关老庄之记录亦不足为奇。

贞观元年(859)四月十八日条记曰，皇太后愿文中有“未从汾水之游，俄迁鼎湖之驾”，“然则道之精华，未坠于地；义之骨髓，犹在于人”，“大庭兴梦，无为之化可及；丰谷腾歌，有截之风弥长”。^③从原文上下文看，文中的“道之精华”与“无为之化”意理相通，而“汾水之游”则取之于《庄子·逍遥游》中“汾水之阳”^④的故事，“鼎湖之驾”则是黄帝于鼎湖升仙的故事。“大庭兴梦”句可理解为，天皇朝廷的日本梦，即无为的理想可以实现，五谷丰登，四处欢歌，诚礼待客的和谐社会绵延攸长。“有截之风”乃取自唐代之前已广泛流行、后传入日本的《世说新语》，指晋陶侃家贫，其母剪发治饌款客、剪碎草垫喂客之马的故事。^⑤

贞观二年(860)十一月十六日条记曰：“(清和天皇)诏曰：皇天无亲，以万物为刍狗；圣人无心，以百姓为耳目。是以资生无沫(一作‘涯’)，不言之化克隆；乐推不厌，无为之业长逸。”^⑥不言而喻，此“皇天无亲”，乃取自《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

①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三代実録 前編』、吉川弘文館、1983年、1頁。

② 《老子道德经》，《四部备要》(第53册)，第3页。

③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三代実録 前編』、25頁、26頁。

④ 《庄子》，《四部备要》(第53册)，第6页。

⑤ 《世说新语》，《四部备要》(第55册)，第94页。

⑥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三代実録 前編』、59頁。

怀”^①，“以万物为刍狗”乃《老子道德经》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②之翻版，“圣人无心，以百姓为耳目”为《老子道德经》中“圣人之在天下惻惻，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③的改语，而“无为之业”则是以老子无为思想视天皇之任的表述。这是老子思想对古代日本政治影响深刻的又一重要例证。

贞观三年(861)八月六日条记曰“释奠如常，外从五位下行直讲六人部福贞讲周易。”八月十六日条记曰“天皇始讲论语，正五位下行大学博士大春日朝臣雄继侍讲。”^④

贞观八年(866)二月一日条记曰“释奠，外从五位下行直讲苾田首安雄讲周易。文章生等赋诗如常。”^⑤

贞观十年(868)六月十一日条记曰“美浓权守从五位上滋野朝臣安城卒。安城尤好老庄，诸道人等受其训说。卒时年六十八，良干之父也。”^⑥这表明直至9世纪后期，老庄之学仍时兴不衰，未贯通此学问则难受朝廷重任、成为“良干”。此段记录中之“诸道人等”是否“诸位道士”之意，值得注意。

元庆七年(883)二月十日条记曰“释奠于大学。祭礼已了，外从五位下行助教净野朝臣宫雄讲周易。文章生学生等赋诗。”^⑦

仁和二年(886)八月一日条记曰“释奠如常。祭祀礼毕，太政大臣入庙，拜文宣王影。公卿大夫毕会，令明经博士讲论周易。文章生等赋诗如常。”八月二日条记曰“明经博士率得业生学生等，奉参内里。天皇御紫宸殿，引见博士等，一一令论五经义，赐禄有差。”^⑧

上数条皆为释奠记录，讲学内容皆为周易。《日本三代实录》对释奠的记录颇详细，每年元旦的朝贺、元月八日开设的读经会(主要由佛僧诵读护国安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及各类般若经、法华经等)，以及二月、八

① 《尚书》，《四部备要》(第1册)，第65页。

② 《老子道德经》，《四部备要》(第53册)，第4页。

③ 《老子道德经》，《四部备要》(第53册)，第18页。

④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三代実録 前編』、78頁。

⑤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三代実録 前編』、176頁。

⑥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三代実録 前編』、233頁。

⑦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三代実録 前編』、533頁。

⑧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普及版 日本三代実録 後編』、吉川弘文館、1983年、615頁。

月在大学寮举行的两次释奠活动,是朝廷一年中最重要的例行公事活动。释奠讲学除《周易》外,还有《论语》、《孝经》、《左传》、《尚书》、《礼记》、《毛诗》以及《诗经》等,但其中《周易》似乎是位居第一的学问。^①释奠是天皇时而幸之、亲自过问甚至亲自出讲,太政大臣以下全部高级官僚出席的学术活动,由此可见释奠在古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释奠对统一官员思想认识、提高官员精神境界具有重要作用,而其中道、儒两家的学说主张互为砥进,而非排斥。当然,加上释家,则为道、儒、释三家共支古代日本社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日本六国史”中的丰富史料充分证实,中国道、儒、史、释传入古代日本,一向多讲实际、少有理论,日本统治阶级奉若至宝,欲充分利用发挥其社会价值,释教成为其护国顺民之工具,史学成为其借鉴之镜,道、儒二教成为其建国发展之理论基础、各级官员修身养性之规范。日本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正应对中国唐朝玄宗及以后时期。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包括道文化在内的中国古代先进文化东传日本,这是清晰无辩的历史事实。

The Spread of Taoist Culture in China-Japan

Cultural Exchanges (I)

Jiang Lifeng

Abstract: The spread of Chinese Taoist culture to ancient Japa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For a long time, Japanese scholars have done a series of researches, the main view of which, however, is that the religious organization of Taoism has never been passed to Japan and the Japanese words of “Emperor” and “Shinto”, which borrow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no links with Taoism. Furthermore, those researches,

^① 《养老律令》中的《学令》明确规定从五位以上官员的子孙中选拔的大学生必学的经典是:“凡经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学者兼习之。”由此可见易学的重要性。参见惟宗直本編・石川介(蕉園)校『令集解』(第十五卷)、東京書林、1871年、5頁、6頁。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 deny the great influence of Chinese Taoist cul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Japanese society since it was spread to Japan. The researches of Chinese scholars basically take the same path. By reviewing and interpreting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circums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Japanese society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pread of Chinese Taoist culture to Japan through the cultural path in Northeast Asia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ideology and mentalit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 as well as ways of governance of the Japanese ruling class. Chinese Taoist culture ,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Buddhist culture have become the three major pillar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Japanese society , which should be fully acknowledged.

Keywords: China-Japan Cultural Exchanges; Taoist Culture; Taoism; Japanese Emperor; Shintoism; Four Mythical Animals